

文史趣谈

三袁兄弟:晚明时期的
“公安文旅推荐官”

□ 余波

近日,2025荆州文化旅游发展大会圆满落幕,来自五湖四海的嘉宾齐聚古城,参加了这场文旅盛宴。会上,荆州向全国旅行商全景式展现了旅游资源的独特魅力,开启建设全国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的宏伟新篇。

盛会的光影里,我想起了四百年前三位“本土文旅推手”的身影——那便是公安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在晚明文学革新的激流中,这三位生于斯、长于斯的荆州公安人,不仅以“公安派”的锐气划破复古文风的沉沉雾霭,更以笔作心镜,深情聚焦故乡公安的河流、田野、市井与风物。他们用独树一帜的“性灵”笔墨,为晚明的公安镌刻下鲜活而温热的文字影像,成为当之无愧的“公安文旅推荐官”。

三袁的一生,与公安水土血脉相连。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纵然宦海浮沉,足迹遍布四方,笔尖却始终牵系着家乡的草山山川、市井烟火。其笔下的公安,绝非泛泛而论的“楚地风光”,而是浸润着体温的“家山景致”,字里行间流淌着对故土的熟稔与刻骨眷恋。

袁宏道对家乡的摹写尤为鲜活灵动。在《公安竹枝词》里,他以清新明快的语言,勾勒出公安乡野的日常韵律:“布谷催春到楚乡,田夫荷锄正农忙。自从梅里收新麦,不见人间几日荒。”诗中不见华辞丽藻,却精准捕捉了江汉平原公安段春耕的脉动——布谷的清啼、农人荷锄的身影、新麦归仓后的田野,宛如一卷流动的“家乡风物图鉴”,瞬间将人引入公安农耕生活的悠然节奏。

锦石滩是明代公安县著名景观“石洲待月”,为“公安八景”之一。袁宏道的《锦石滩》同样精彩,文中描绘江心涌出的石洲:“长可五六里,满洲皆五色石子。或洁白如玉,或红黄透明如玛瑙”,周边江水似净练环绕,洲上繁花似锦。这般景致经他妙笔勾勒,让人对公安的奇景心生向往。

袁中道则倾心于描摹公安的水乡情韵。在《游孟家溪记》中,他细细勾勒了家乡孟家溪的景致:“溪阔丈余,水碧如黛,夹岸皆菰蒲,风过有声,如环佩鸣。渔人撒网溪中,鸕鶿随船飞落,倏忽往来。”孟家溪不过是公安一个寻常小镇,袁中道却以孩童般的纯净目光重新打量它:那如黛的水色、菰蒲随风摇曳的清响、渔人与鸕鶿间默契的互动,将一条无名溪流点染得诗意盎然。这份对“幽微景致”的专注,恰似今人发掘“家乡秘境”的旅游博主,赋予寻常风物以被凝视、被珍爱的价值。

即便是一向沉静内敛的袁宗道,也在尺牍素笺间不经意流露对家乡风物的偏爱。他在《王宪睿督学滇中归,阻风雪于公安,留觞二首其二》中写道:“最爱新年雪,能留竟日觞。”虽未直接描绘公安景色,却借雪天留客畅饮之事,传递出家乡冬日的温馨。而在致友人信中,他感慨“公安秋晚,稻粱满野,白鸥群集,登楼一望,天地皆黄,此乐非宦途可得也”,寥寥数语便晕染出江汉平原公安片区秋日丰收的壮阔图景——无垠的金黄稻田、翔集的白鸥、登楼远眺的开阔视野,其中蕴藏的,正是公安人心中那份关于“故园秋色”的永恒记忆。

他们的书写不止于自然景致,更深入市井肌理的纹理。袁宏道在《竹枝词》中捕捉公安的市集剪影:“市头米价新来贱,一斛才消二百钱。小妇牵船江上去,阿翁沽酒待归船。”市集的米价波动、妇人撑船远去的背影、老翁温酒待归的期盼,将公安水乡“靠水吃水”的生活细节徐徐铺展,如同一帧帧“家乡生活实录”,让读者指尖仿佛触碰到晚明公安那温热的人间烟火。

三袁之所以堪称“公安文旅推荐官”,其核心魅力在于“性灵”风格赋予文字的直抵人心的力量。这种风格摒弃“楚地雄奇”的宏大叙事,亦不堆砌“楚辞汉赋”的厚重典故,而是以“真”为魂,以“活”为骨,如同用手机随手记录家乡的片段,鲜活、质朴,带着泥土与河水的原生气息。

他们写家乡,有意避开文人惯用的艰深辞藻,多采撷江汉方言的明快节奏。如袁宏道《公安竹枝词》中“布谷催春到楚乡”“小妇牵船江上去”,语言直白如俚语乡音,宛若田间陌上随口哼唱的小调,读来毫无隔阂。这种“说人话”的表达,既让公安的故事深入乡邻心田,也让异乡客轻易便能踏入这片水土的脉搏。

三袁兄弟从不将家乡当作“观光景点”来远观,而是以“生活在此间”的亲历者视角书写。袁中道写孟家溪,不夸它“堪比潇湘”,只记取“渔人撒网、鸕鶿随船”的日常趣味;袁宏道写市集,不赞“商贾云集”的繁华,倒像是今日的“探店网红”,只录下“米价”“沽酒”这般琐碎却真实的细节。这种平视的、融入的姿态,

让公安的山水不再是“远方的风景”,而是“推窗即见的日常”,充满了熨帖人心的亲切。

他们写家乡,情之所至,喜则直抒胸臆,念则坦荡自然。袁宗道一句“登楼一望,天地皆黄,此乐非宦途可得”,直白道尽对家乡秋色的偏嗜;袁宏道离乡时吟咏“梦里常牵公安水,船头犹带楚烟香”,将对公安的眷恋织入“水”的幽梦与“烟”的气息。无需刻意煽情,“爱乡”的情愫已在字里行间自然流淌。

作为“公安文旅推荐官”,三袁的贡献远超记录本身,更在于让公安之美穿透地域的藩篱,成为晚明文人圈层中一个鲜活的“文化印记”。

他们是公安风貌的“活的记忆库”。晚明的公安,虽为楚地重镇,但相关文献多着眼于城池官署,鲜有细致描摹乡野风光与市井民俗者。三袁的诗文恰如其分地填补了这片空白:孟家溪的水色光影、公安市集的柴米油盐、江汉平原的春耕秋收……这些细腻如丝的记录,为后世研究晚明公安地理风物、民生百态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素材,让“纸上的公安”拥有了可触可感的血肉肌理。

三袁兄弟是公安魅力的“无形推手”。三袁诗文在晚明文人圈中广为传诵,袁宏道的《公安竹枝词》、袁中道的《游孟家溪记》,让异乡士子得以透过文字“神游”公安。时人展卷,见“楚乡春事”的生机,“溪畔渔歌”的闲逸,便对这片水土心生向往——“推荐官”的如椽之笔,让公安之名随着墨香飘向更辽阔的远方。

他们更为公安赋予了独特的“文化品格”。在三袁之前,荆州的文化意象常与屈原、宋玉的“楚辞悲情”紧密相连;而三袁笔下的公安,是“稻粱满野”的丰饶生机,是“小妇牵船”的灵动烟火,是“登楼望秋”的澹泊安然。这种“人间烟火的公安”,成为与“悲情楚地”并行的另一重文化意象,极大地丰富了荆州乃至楚文化的深层意蕴。

如今,重读三袁的墨痕,我们仍能从“布谷催春”的呼唤、“溪畔鸕鶿”的翩跹里,触摸到晚明公安那未曾冷却的温度。在荆州擘画建设全国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的当下,这三位“公安文旅推荐官”留下的文字,恰似公安递给世界的一张古老而永恒鲜活的名片。诚然,世间最动人的文旅推荐,永远根植于对故乡那片土地最深沉、最本真的挚爱。

许倬云先生笔下的沙市记忆

□ 余大中



许倬云。

八月四日,史学大家许倬云先生在美国匹兹堡辞世,享年九十五岁。

说起来,许倬云与沙市缘分深厚。笔者简要梳理《长江小史》等文献中关于沙市的诸多文字记述,回顾许倬云1934年至1938年在沙市的童年生活,以寄托对先生的缅怀之情。

1934年,四岁的许倬云随父亲许凤藻由厦门移居沙市。许凤藻时任湖北荆沙关监督,其公署设于沙市洋码头,这一地理位置成为许倬云童年生活的重要场景。他在《长江小史》中介绍,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辟沙市为通商口岸,次年日本在沙市设立领事馆并划定租界。1898年,因招商局更夫周顺兴杀人事件,引发“火烧洋码头事件”,民众冲进招商局沙市办事处打砸纵火,火势蔓延至日本领事馆、英国把持的沙市海关等地。事后,清廷在日英两国压力下严惩相关人员,赔偿白银并划定日本永久租界,英国亦

获赔偿。这些历史片段,在许倬云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许倬云在沙市经历了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的平静生活。洋码头作为沙市海关所在地,既是轮船、木船的进出港,也是各类大宗商品的集散地。童年的许倬云喜欢到堤岸边看船,大木船、小木船、大轮船、小轮船、拖船、驳船,都令他看得津津有味。他曾经写道:“破晓时分,挑夫们的号子惊醒江雾,货栈闸板哗啦啦卸下;而黄昏收工后,汗臭与酒气混着胡琴声,飘进临江的吊脚楼——那里有女子唱‘沙市谣’,调子比江水还愁。”沙市洋码头临江马路的汽笛声、打包厂的机器轰鸣与长江的波涛声交织,构成了一幅动态的历史画卷。

沙市作为长江沿岸的重要港口,其繁忙的航运与商业活动为许倬云提供了独特的成长环境。尽管他因先天残疾需在亲人帮助下锻炼行走,但母亲章舜英的启蒙教育与沙市的文化氛围共同塑造了他的早期认知。他曾经描述:“江轮鸣笛声里,挑夫们弓着腰卸完最后一船货,茶馆的汽灯便一盏盏亮起来。这时总有人拉起胡琴,唱几句沙市调,词里尽是‘走川江’‘过洞庭’的漂泊。”这些场景,在他的记忆中经久不衰。

许倬云对沙市充满了深厚的感情。他提到,沙市的老工人经常捎着他到堤岸边看船,陪他江边散步,这种陪伴和关爱让他感受到温暖与慰藉;同时,沙市的历史文化也深深吸引着他们,为他后来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基础。然而,他也从小目睹了洪水与战争这两种人类难以抗拒的力量,铭记着洪水肆虐、战火纷飞苦难。

1935年长江流域发生严重洪水,沙市作为沿江城市受灾严重。许倬云在《长江小史》及访谈中多次提及童年目睹

的洪水场景:“荆江大堤堆金台堤段溃口,江水如野马奔腾,荆州城被淹过城门,沙市被淹至中山马路北沿,千家万户流离失所。”“洪水来临时,家人用澡盆划水逃生,外面的船无法进入院子,需用锯子、斧头打开大门缺口才能划到走廊旁接人。”“沙市人用门板抬尸,而盐商们已在商议如何涨价。江水的肆虐与人心的算计,原来一般无情。”许倬云对1935年沙市溃堤的个人回忆,反映了灾后社会乱象与人性反思。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沙市作为长江中游重要港口,成为军事要冲与难民中转站。1938年初,台儿庄战役前夕,许倬云目睹一支川军从四川出发,经沙市转赴前线。这支部队身着青灰色灰布军装,每人配一把大刀、一个背包、一支步枪,整齐地挤满临江路。许母忙着招呼工人烧水供士兵饮用,疲惫不堪。年仅七八岁的许倬云坐在门口下马石旁,看着这些年轻士兵从眼前走过。母亲轻声叹息:“这些人可能再也回不来了。”这句话如重锤般击中他,让他“一夜之间长大”,隐约意识到战争的残酷与生命的脆弱。

1938年10月,武汉会战爆发,沙市危在旦夕。日军逼近的消息不断传来,全家不得不紧急撤离。许倬云在“战前最后一班船”中写道:“母亲攥紧我的手挤过人群,身后是拎着皮箱的管家。跳板上有人跌落,哭声瞬间被汽笛吞没。我记得那天夕阳如血,江面浮着碎纸般的船票。”这场战乱带来的灾难,成为他童年最深刻的记忆之一。

撤离沙市后,许倬云随家人辗转逃难至四川万县、重庆等地,最终于1949年迁居台湾。尽管此后再来回到沙市,但这座城市的记忆始终萦绕在他心中。他曾在著作中多次提及沙市的历史地位,并将其作为观察中国社会变迁的微观样本。

文化漫谈

芸芸众生的无奈与坚守
——《浪浪山的小妖怪》观后感

□ 老鱼

“喂,妈,我在大王洞挺好的,刚升了小头目!”小猪妖一边用袖子擦鼻血,一边对传音符那头的母亲报平安。这时,后排有个孩子小声问:“妈妈,小猪妖后来去哪儿了?”母亲没回答,只轻轻“嘘”了一下。那一声“嘘”,像把钝刀,把影院里所有成年人的哽咽都按回了喉咙里。后排的快递小哥“噗嗤”笑出了声,又赶紧低头假装在找手机。那一瞬间,我知道,这片子成了。

电影把镜头对准了四个“战五渣”:小猪妖、黄鼠狼、猩猩怪、蛤蟆精。他们没背景、没法宝,只有一张写着“9981”的工牌,像极了打工人在脖子上的门禁卡。

浪浪山是什么?是房租押一付三的隔断房,是月末永远不够还的信用卡,是群里@所有人的“收到请回复”。导演冷不丁说英文片名叫《Nobody》,翻译过来就是“查无此人”——写字楼电梯里,谁不是贴着墙站的小透明?

电影里,黄眉怪说:“你们这些底层妖怪,生来就是凑数的。”声音不高,却像空调风,吹得人骨头缝都凉。影院里有人笑,笑声很短,就像被人关了电闸戛然而止。我们都知道,这句话不是台词,是考勤机上的红字:“迟到一分钟,扣五十。”

影片最扎心的,不是小妖怪被黄眉怪一拳打飞,而是他们好不容易逃出浪浪山,抬头一看,前面还有一座更高的狮驼岭。

这些,像极了觉得攒够了钱提出离职,以为能去大理躺平,结果高铁票还没改签,房东就发来涨租通知;像极了挤进大厂的外包工位,以为跳出了小工厂,却只是换了个更亮的格子间继续996。电影里一句台词弹幕刷屏:“世界是巨大的东北,到哪都是雪。”

可片子最动人的,也正在这里——黄鼠狼精把挖矿的铁锹磨成了“沙僧同款宝杖”,兵器谱上没它名字,但抡起来照样能挡一记重锤;小猪妖被烧光了鬃毛,还死死护住那只没送出的葫芦水壶——那是妈妈怕他路上渴,偷偷塞的。

像极了在地铁口卖烤肠的大姐,给每根肠都认真划上花刀;像极了深夜的外卖骑手,把摔散的餐重新包好,在门口鞠个90度的躬。生活确实没给他们剧本,但他们偏要给自己加戏:既然拿不到主角光环,那就自己打个补丁。

影片结尾,村民给四个小妖立了座小庙,没有佛像,只有四只奇形怪状的泥塑,香火却旺得出奇。有人说这是荒诞,我却看得眼眶直流——

去年郑州暴雨,地铁口摆满市民自发送去的鲜花;今年高温,上海街头多了一排“免费冰水,外卖员自取”的冷柜。没人记得他们的名字,可一束光点亮另一束光,浪浪山就有了温度。

片尾曲唱:“不是每个人都能走到西天,但每个人都能走出自己的一步。”

于是,散场后,那位快递小哥第一个起身,把座位上的空可乐瓶顺手带出了影院;后排做自媒体的姑娘,在笔记本上敲下标题《四个小妖怪,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我则把电影票的票根,郑重地贴在了工位挡板上——提醒自己:

当不了齐天大圣,就先把今天的工作做完;翻不过浪浪山,那就把脚下的路踩实一点。

芸芸众生,谁不是带着伤赶路?但只要我们像小猪妖一样,把葫芦水壶抱紧,像黄鼠狼精一样,把铁锹磨亮,再低微的尘埃里,也能开出自带光芒的花。

浪浪山一直都在,可那又怎样?山翻不过去,我们就先做自己的孙悟空。

影片最后一分钟,没有胜利,没有封赏。只是四个遍体鳞伤的妖怪,拖着步子回到破庙,把漏雨的屋顶重新铺了草。黄鼠狼精的指甲刀彻底卷了刃,他拿石头把它敲直,继续切菜。猩猩怪的锅裂缝更大,他用泥巴糊了一道,又糊一道。小猪妖把剩下的半壶水倒进锅里,水太少,只够煮一把野菜。

镜头拉远,夕阳把他们的影子钉在墙上,像四枚小小的钉子。字幕缓缓浮起:

“众生皆苦,可众生皆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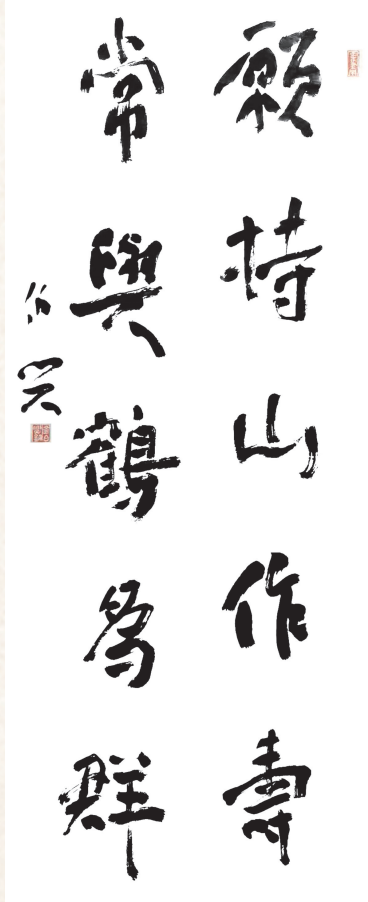
对于芸芸众生,浪浪山一直都在,只是有人把山背在了身上,有人把山煮进了汤里。

我们翻不过去,但可以像他们一样,在漏雨的屋檐下,把最后半壶水倒进锅里,等水开。

众生皆苦,可众生皆在。

苦不会消失,但若里长出来的那点暖,能让我们撑到下一个天亮。

翰墨荆楚③



愿持山作寿 常与鹤为群

金伯兴 书